

论城镇化进程中“理性经济家庭”的迁移抉择——解释框架及上海郊区的实证

The Process of Peri-Urbanization and Family Choic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Case Study of Suburban Districts of Shanghai

朱金

文章编号1673-8985(2016)06-0123-09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摘要 经济快速发展及城乡资源再配置衍生了大量流动人口和留守家庭成员,这是过去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表象,同时也构成了城镇化发展中的现实困境。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而人都从属于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因而需要进行以家庭为单元的城镇化微观视角研究。无数个体家庭在既定的制度下,会进行家庭的劳动力状况及迁移的成本收益分析,从而做出迁移决策。从微观视角研究以家庭为单元的城镇化主体行为抉择;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构建理性经济家庭迁移决策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家庭这一城镇化主体的综合考量过程。进而以上海郊区这一既有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又存在本地农民城镇化的典型地域为例,基于实证而演绎本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两类理性经济家庭的迁移决策及对家庭存量资产的配置。

Abstract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ve given rise to the huge amount of migrating population and family members left behind. Many of the migrants live in metropolitan suburban areas, and create the phenomenon of peri-urbanization, which is a dilemma and major challenge faced b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puts emphases on human-oriented development. Family is the basic unit of human-being, so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microscope perspective approach of research, which explores families' choic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is paper,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rational-economic family is set up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empirical testing on both cases of migrant families and local rural families is carried out in the suburban districts of Shanghai.

关键词 半城镇化 | 理性经济家庭 | 迁移决策 | 解释框架

Keywords Peri-urbanization | Rational-economic family | Migration choice | Analysis framework

作者简介

朱金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博士研究生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控制和计划约束大幅减少,微观层面的活力则大为增强;无数个体的自主选择塑造了城乡人口流动的宏观景象,民众日益成为城镇化主要动力,政府在城镇化中的角色逐步弱化。由此可以认为,人口流动及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决策机制是城镇化研究中的重要视角和新的方向。赵民等(2013)从“人口流动”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我国不同区域城镇化的发展特征,认为过去以人口长期异地流动为表征的“不完全城镇化”将难以为继;同时,我国的城镇化存在明显

的非对称转移现象和结构性失衡问题^[1-3],即农村外出人群主要为劳动年龄段人口,举家进城比例低,并呈现明显的“半城镇化”状态^[4-6],这种“半城镇化”是流动人口在回归农村与彻底城镇化二者间的个体决策使然。

那么,流动人口徘徊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镇化抉择的现实考量是什么?背后机制又如何?新古典经济学通过理性经济人解释个体迁移,即认为人口的迁移是个体自我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仅在迁移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迁移才可能发生^[7]。而发展经济学越来越认识到人的迁移不仅是个体行为,家庭而非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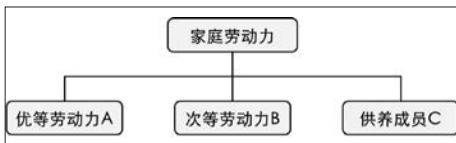


图1 家庭劳动力构成

扮演着经济主体的角色^[6]。西方有学者较早关注到了个体迁移过程中的家庭因素，从“理性个体”的视角转为“理性家庭”的视角来解释迁移的决策模式、机制及其后果；认为家庭净收益而非个人净收益的最大化不断驱动着迁移行为的发生，因此迁移通常是家庭为增加收入及收入来源而采取的策略^[9-10]。具体来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农民家庭通过部分家庭成员的外出打工，赚取工资并将其支援老家是确保贫穷农村家庭得以生存的重要依托^[11-13]。当然，在经济因素之外，有关研究也关注到了非经济因素（诸如社会联系等）对家庭迁移决策的影响^[14-15]；如，家庭成员的长期分居会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疏离，因而有部分家庭为了保持家庭成员的内部亲密而放弃部分更高经济利益^[16]。综合而言，个体的迁移实际上是家庭在考虑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基础上的理性迁移策略选择。国内学界对人口流动机制的家庭解释也在逐步深化。曾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是个人或家庭在对经济机会和经济风险综合权衡后的理性选择^[17]；近年来，赵民等学者基于中国若干地区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中国城镇化的“理性经济家庭”观点，认为在既定预算约束下，家庭是城镇化中的理性经济单元，人口迁移及其家庭成员迁移模式选择是家庭内部理性选择的策略组合^[18-19]。笔者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理性经济家庭的价值判断和迁移决策是如何形成的。本文首先进行理论层面的诠释，构建起“理性经济家庭迁移决策框架”；随后以上海郊区为例，以本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两类具有异质自身发展条件的城镇化群体为样本，对两类群体的既有家庭迁移抉择行为进行实证研究。

1 理性经济家庭与家庭迁移抉择

1.1 理性经济家庭

家庭劳动力是具有人力资本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劳动力需要承担照顾老人、抚养小孩以及创造劳动收入的责任，因此需要为实现家庭整体和长远目标而服从家庭劳动力配置决策；性别角色、年龄、劳动能力和素质等是家庭对其劳动力进行就业和空间配置（迁移或留守）的重要考量因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状况是丈夫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原籍以及年轻人外出、老年人留守原籍^[13,20]。这也说明了家庭内部存在着优等劳动力、次等劳动力以及供养人口的分别（图1）。

1.1.1 “利己”的家庭：家庭对劳动力的理性经济配置

家庭成员在消费时通常共享预算约束。对于传统农民家庭而言，当其家庭劳动力被局限在第一产业时，通常会进行多元化经营以避免单一作物的产量风险和市场价格风险^[21]。随着城乡二元就业制度的破除和对人口流动的放开，农村劳动力得以跨部门和跨地域流动，因此家庭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也逐渐多元化；为追求家庭总收入最大化，家庭通常会将劳动力分别配置在适应于其素质水平的不同经济部门，亦即按其能力进行配置，或进城定居，或者留村从事农业。另外，出于规避风险及对既有农村土地、住房等存量资产的考虑，家庭倾向于将劳动能力相对低的老弱成员留在农村以经营及守护农村资产。另外，在农村土地不能与城镇土地进行等价交换以及土地回收政策的结构性背景下，农村土地对于劳动力尤其是次等劳动力的拉力仍然存在。因此，家庭有对劳动力资源统筹配置的主客观原因，农村劳动力是否进城务工甚至定居并不仅仅是基于其个体的偏好，而是以整个家庭的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为诉求。

1.1.2 “利他”的家庭：家庭内部的利他动机使劳动力服从家庭决策

家庭作为整体是“利己”的，但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是存在利他动机的，这也是贝克尔新家庭经济学的理论基础^[22]。部分家庭成员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以支持家庭的最大利益，家

庭内部利他主义的转移支付保障了家庭的整体利益^[23]。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利他性也是农村家庭劳动力服从家庭决策、进城打工甚至定居或者返乡务农的内在动力。

家庭内部的利他性动机使得家庭成员的迁移决策总是考虑到家庭其他成员；理性经济家庭趋于将家庭内部劳动力置于最合适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在当前阶段，经济收益仍是首要因素。具体而言，能力强、年纪轻、身体好的家庭成员向外流动至城镇务工赚取较高额的工资收入；而相对次等劳动力选择在就近的小城镇就业实现工农兼业；最次等劳动力（老人及就业竞争力较弱的家庭成员）只能留在农村种地或帮忙照顾小孩^[2]。出于这样的利他性动机，外出劳动力即使在非农部门辛劳工作、远离家人及故乡并过着相对艰辛的生活，仍能服从家庭劳动力配置决策；当老家农忙时节，进城劳动力也甘于服从家庭安排回乡务农；为了发挥老家的存量资产效用，相当部分家庭成员在城乡间兼业和“两栖”生活。

1.2 迁移抉择的解释框架

家庭成员的迁移是件大事，一般都会充分考虑迁移成本和预期收益；在此假设，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才会做出迁移决策。在对既有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启发下，建立进城家庭的迁移判断和决策分析框架（图2）：家庭在做出迁移决策之前，会对迁移进行多元价值判断，即通过对迁移收益、自身条件和禀赋以及迁移成本等因素进行客观判断。收益主要包括城镇的就业机会、人居环境、社会福利、公共设施等；而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了自身的条件和禀赋；同时迁移可能面临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

本文分析框架基于以下假设：家庭及其内部成员以整体经济收益高低为依据做出迁移决策；家庭成员在家庭整体经济收益判断下根据个体经济收益和内部利他动机发生逐次迁移，优等劳动力A先发生迁移，次等劳动力B和纯供养人口C在优等劳动力后逐次迁移。

根据Davanzo (1972) 针对美国家庭迁移的理论模型^[24],当一个家庭考虑从*i*地向*j*地迁移时,仅当满足

$$\sum_{t=0}^T \frac{Y_{jt}}{(1+r)^t} - \sum_{t=0}^T \frac{Y_{it}}{(1+r)^t} - \sum_{t=0}^T \frac{C_{ijt}}{(1+r)^t} > 0$$

即 $NE > 0$ 这一条件时,家庭才会迁移。其中 Y_{jt} 表示*t*时期家庭从*i*地迁至*j*地的预期家庭收入, Y_{it} 表示*t*时期家庭留在*i*地的预期家庭收入, C_{ijt} 为迁移成本, T 为剩余生命周期长度, r 为贴现率, NE 表示净收益。进一步考虑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并加入对家庭优等劳动力*A*、次等劳动力*B*、供养成员*C*的讨论,优等劳动力*A*代指家庭中人力资本比较优势最大的成员,一般为青壮年男性,次等劳动力*B*一般指青壮年女性及中老年男性,供养人口*C*为家庭老人和小孩。

当 $NE < 0$, $NE_A =$

$$\sum_{t=0}^T \frac{YA_{jt}}{(1+r)^t} - \sum_{t=0}^T \frac{YA_{it}}{(1+r)^t} - \sum_{t=0}^T \frac{CA_{ijt}}{(1+r)^t} > 0$$

$NE_A + NE_B < 0$ 且 $NE_A + NE_C < 0$ 时,即仅有优等劳动力*A*的迁移净收益为正,且*A*携带*B*或*C*都无法使迁移成员的净收益为正,此时家庭会选择让优等劳动力*A*先期迁移。*B*和*C*留在原籍可配置老家的宅基地和耕地,可使家庭迁移成本 C_{ijt} 有效降低。现实中,农民进入城镇后将面临租房等巨大的经济成本,即使农民工与市民能够同工同酬,但在住房等资产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方面仍差距巨大。

当 $NE < 0$ 时, $NE_A =$

$$\sum_{t=0}^T \frac{YA_{jt}}{(1+r)^t} - \sum_{t=0}^T \frac{YA_{it}}{(1+r)^t} - \sum_{t=0}^T \frac{CA_{ijt}}{(1+r)^t} > 0$$

$NE_B < 0$,但 $NE_A + NE_B > 0$ 时,即优等劳动力*A*携带次等劳动力*B*一同迁移仍能使迁移净收益为正,此时家庭会根据家庭供养成员*C*的情况,选择让次等劳动力*B*与*A*一同迁移或是留在原籍。*C*留在原籍亦可降低迁移成本 C_{ijt} 。现实中,当家中老人可以自理生活,次等劳动力也会选择外出务工,当老人或因家中子女在原籍上学而乏人照料时,次等劳动力选择留守原籍。

当 $NE > 0$,此时出现了支撑举家迁移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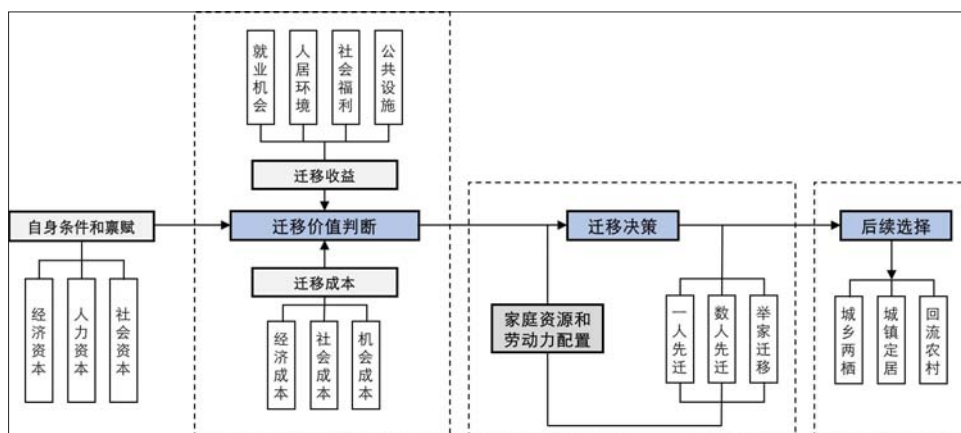


图2 进城人口的迁移判断和决策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论条件,即优等劳动力*A*、次等劳动力*B*与供养人口*C*一起迁移,但由于中国农村存量资产产权无法进行清晰分割,*A*和*B*先期迁移之后,留守家庭成员*C*最后迁移的成本 CC_{ijt} 远高于 CA_{ijt} 和 CB_{ijt} 。因此只有先期迁移的家庭成员*A*和*B*所得收益远大于举家迁移所付的机会成本时,才能发生举家迁移。此外对于供养人口*C*,特别是老人而言,其留在农村还有从事农业劳作的经济意义,如果进入城镇,则不具竞争力,其对非农部门而言的经济价值将十分微弱。

可见,迁移的价值判断是一个综合考量过程,正是千万个家庭的迁移判断及决策造就了我国大规模的人口城乡流动。根据先行迁移人口在城镇工作生活情况,家庭会进而做出后续选择,即决定是否举家迁徙、努力在城镇定居,或是返回农村,抑或是继续城乡两栖的生活状态。由此可以推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至真正实现城镇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2 上海郊区的实证研究

上海郊区近年来城镇化发展加快,2013年户籍人口非农化率已达90%。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外来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提供了研究素材。郊区人口流动已由从中心城区迁出为主转向以外来人口导入为主,流动动机从早期以拆迁安家向谋求就业机会转变^[25]。郊区人

口的增长远高于中心城区,城镇化的数量增长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一方面,郊区工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推动了郊区城镇化^[26],但同时也引发了居住环境下降以及社会和环境问题^[27-28]。另一方面,本地农民也存在城镇化意愿和实际迁移,迁入城区居住的同时仍保留郊区房屋用于向外来流动人口出租。城郊地域既存在外来流动人口,也存在本地人口迁移,且二者在“迁居”、“租赁”等活动中又彼此交织,因此透过对本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两类家庭的调查可为前述解释框架提供实证支持。下文的数据来源,一是官方的统计资料,二是村庄抽样调查。抽样调查于2015年5月进行,以上海嘉定区北部某典型村庄对象,分别向本地农民家庭和外来农民工家庭发放问卷180份和140份;回收有效问卷151份和109份。以下基于统计资料和问卷数据,并辅以实地考察的发现而做实证分析。

2.1 本地农民家庭

上海城镇化进程起步较早,本地农民数量自1990年代开始平稳下降,如今农业户籍人口占比约10% (图3)。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导致了农民数量的减少,也直接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收入构成。上海郊区(尤其近郊区)实际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民数量已相当有限,从收入构成



图3 上海市农业和非农户籍人口变化情况 (1990—2014年)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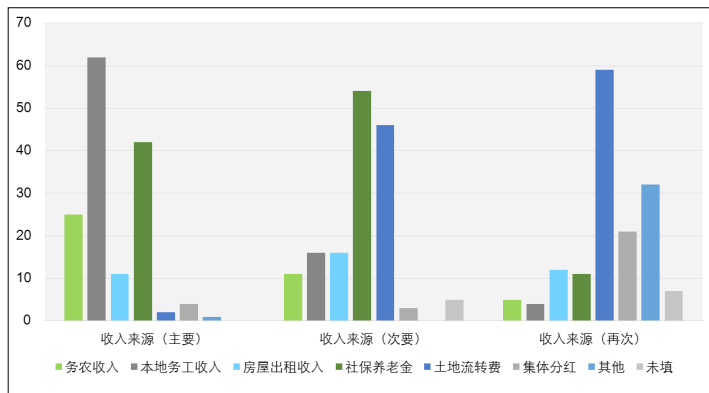


图4 本地农民不同收入来源的选择人数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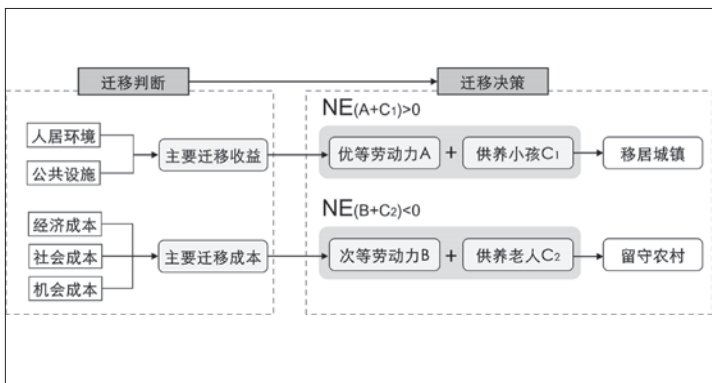


图5 本地农民家庭的迁移判断与决策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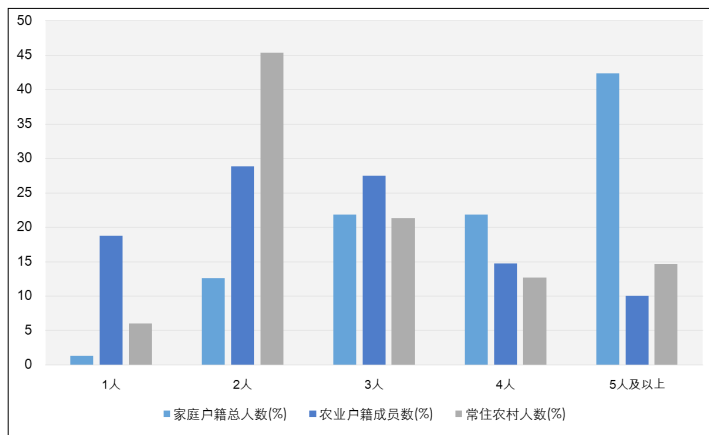


图6 家庭内部成员的户籍和居住情况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来看,上海市郊农村居民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所占比重较大,而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逐年下降,现已不足5%^[6]。从调查结果来看,本地农民的主导收入依次为务工收入、社保养老金、土地流转费(图4),本地农民经济意义的非农化已十分显著。

2.1.1 城镇化意愿及家庭迁移决策

本地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强烈,特别是年轻村民进城购房定居的现象已较普遍,郊区城区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构成的优质人居空间对本地人口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是整个家庭主要的迁移收益。

在城镇化意愿驱动下,以优等劳动力与供养小孩(即年轻一代小家庭)移居城镇、次等劳动力与供养老人留守原籍农村为主

(图5),或呈城乡两栖状态,而在节假日,年轻家庭也会回到原籍农村探视或相聚。从家庭户籍人数和常住情况看(图6),家庭户籍总人数以5人为主,但农业户籍人数则以2—3人为主,常住农村的家庭人数以2人为主,家中小孩实际居住地也以郊区城区和镇区为主,住在农村的已不足1/4(图7)。即便面临高企的城镇房价,普通农村家庭也会举全家之力为年轻一代购房供其成家之用,目前一半以上的农民家庭在郊区城区或镇区拥有城镇住房且以郊区城区为主(图8)。

尽管城镇化意愿强烈,但由于农村户籍和土地红利逐渐显化,且市郊农业与非农户籍人口在社会福利上的差异在逐渐缩小,放弃农村户籍、退出农村集体的机会成本便不得不考虑——存在着失去承包地和宅基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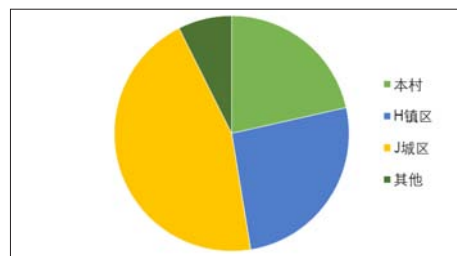


图7 本地农民家庭的小孩常住地点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风险。因而,不少农民选择保留农村户籍而仅实现居住空间的转移,身份的转换滞后于就业和生活方式的转换。老一代本地农民的迁移仍然较难,一方面有对承包地和宅基地的配置的需要,尽可能减少机会成本;其次房价高企,面临很高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那些

在农村生活几十年的老人,早已适应了农村的邻里社会关系,将较难适应城镇生活。

2.1.2 对存量资产的配置

人口的部分迁出必须考虑到既有存量资产的配置,主要包括承包地、宅基地及住房两大块;由于存量资产尚无法变现,因而只能通过继续占有来减少资产沉淀。在调研中发现,承包地的流转在上海郊区十分普遍,并已在很多年,几乎100%的农村都存在承包地流转。

对于宅基地及住房而言,与外地农村的情况有所不同。近年来,尽管本地农民家庭住房建造年代已久,上海郊区农村建房高峰期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所建住宅如今已显破败,大部分房龄在20年以上(图9),但外地农村常见的住房翻建及新建情况在上海郊区农村较少见。一方面,早期房屋的建筑面积较大,而新建房屋所批面积一般不超过180 m²,对于可能面临动拆迁的农村家庭而言,机会成本很高,即改建会带来有效赔偿面积的大幅减少^①,因而农村住房自我更新乏力。在操作层面,各区县对翻建农房的审批十分严格,为降低潜在的拆迁难度,已基本不再批准翻建。在不宜翻建改建原有老住房以及实际居住面积可压缩的情况下,为减少资产沉淀,许多家庭将农村住宅进行细密划分,具体做法包括将多余的一层建筑改造后在主屋破墙开门向外出租,并在自家空地(早期的晒谷场等)上尽可能多建简易房屋以增加可租面积和获取更多收入,并等待进一步的动拆迁(图10)。在外来打工者涌入郊区农村的背景下,这些房屋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外来人口,可增加本地家庭的资产性收入。

农村宅基地的模糊产权形式导致宅基地和住房无法进入市场,制约了农民进入城镇的迁移成本和支付能力,增加了“进城”难度,原有宽松的农村空间随着非正规出租房建设而呈现出高密度特征,种种自发行为可谓导致了乡村环境的杂乱和空间品质的下降。

2.2 外来农民工家庭

随着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以来

的上海市郊制造业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以嘉定为例,2000年来外人口仅为16.2万,占常住人口21.5%,2010年来外人口达82.8万,占常住人口56.3%。外来人口比重大幅增长,因此外来农民工家庭也是郊区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基本单元。

2.2.1 迁移决策及家庭劳动力配置

欠发达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较少且农业利润有限,因此外来农民工家庭通过部分家庭成员跨区域流动就业以增加家庭总收入。据问卷统计,外来农民工家庭在老家的户籍人数普遍大于5人,在沪生活人数2—3人为主,就业人数以2人为主(图11),即以年轻男性或夫妻外出务工为主,而老人和儿童则

较多留在老家。在迁移决策上,家庭优等劳动力流动至发达地区城镇,家庭次等劳动力在老家城镇务工实现工农兼业,而缺乏非农就业能力的供养人口则留守原籍(图12)。

流入城镇的农民工往往是家庭优等劳动力,其流向城镇大部分是基于单一的经济性目的,这也是主要的迁移收益。基于六普数据,上海市郊外来常住人口主要以受教育程度偏低的青壮年为主;流入目的以经济性指向为主,这些外来务工者基于自身劳动条件,主要在郊区从事各类较低端产业活动,绝大多数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零售批发业、住宿餐饮业等低端行业^②。从工业用地的现状分布来看,与外来人口比重、尤其是制造业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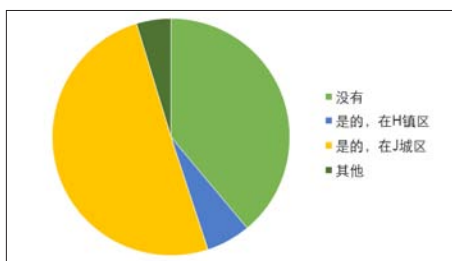


图8 本地农民家庭拥有城镇住房概况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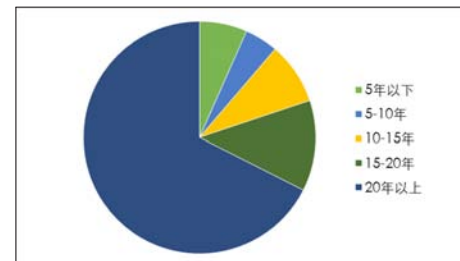


图9 本地农民家庭住房房龄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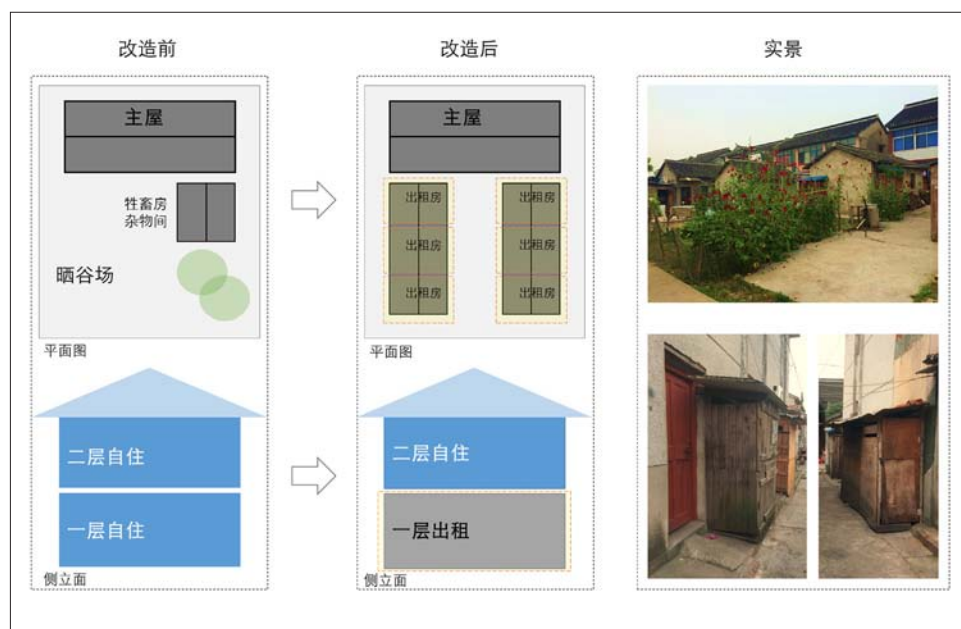


图10 本地农村住宅改造策略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释 ①根据2007年颁布的《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及各区县实施细则,农村4人及以下家庭的宅基地总面积不超过180 m²,其中占地面积不超过90 m²,建筑面积不超过180 m²。这一条例适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村民新建、改建、扩建和翻建住房行为。而早期农民住宅面积大多超过250 m²,不少家庭坐拥300—400 m²的住宅面积,一旦进行改建翻新并履行相应换证手续,许可建筑面积会大为减少。

人口比重分布高度拟合 (图13)。

调研发现外来农民工相当部分收入需寄回老家抚养子女、赡养老人,还需积蓄较大数额以备在老家建房、婚丧嫁娶等开支。他们肩负着支撑家庭的重任,因而需要努力挣钱并选择简朴的生活方式。就居住地而言,一方面农村散布的大量工业用地使很大一部分群体因“离上班工厂较近”而选择居住在工作地周边农村(图14);同时受限于自身较低的收入以及接济老家的经济考量等,租金成本较低也是重要因素,大部分的外来群体不愿承担

在市郊城镇的高额生活成本。靠近镇区或厂区的出租屋月租金为250—400元,略远的村则在100—250元,当然租金还取决于房屋面积、朝向和设施条件等因素。租金水平大大低于在郊区主城区和各镇镇区的租房费用^②。除了显性的低租金外,许多外来打工者通过种植本地家庭废弃的自留地来补给日常食物,可有效降低生活成本。外来农民工的生活状况不仅不及本地城乡居民,甚至劣于在老家的家庭成员,就租赁住房而言,大部分十分破败且不及老家农村的住房条件(图15)。

家庭次等劳动力主要为中老年夫妇,他们中不乏有年轻时外出打工的经历,但出于社会成本的考虑,为赡养家中老人以及孙辈而不得不在老家,选择就近非农就业或工农兼业。就供养人口而言,丧失非农劳动力的老人和部分儿童出于迁移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及有效降低机会成本的考虑而基本留在老家,老人可适当从事农业劳作。随迁子女约有一半常年居住在市郊农村(图16),主要为学龄前儿童,上学后较大部分小孩回老家就学,当然在本地乡镇学校有一定学位空余的条件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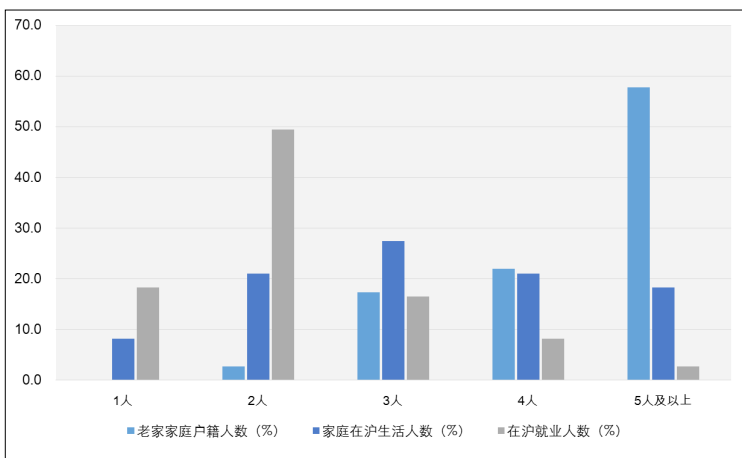


图11 外来农民工家庭户籍人数及在沪生活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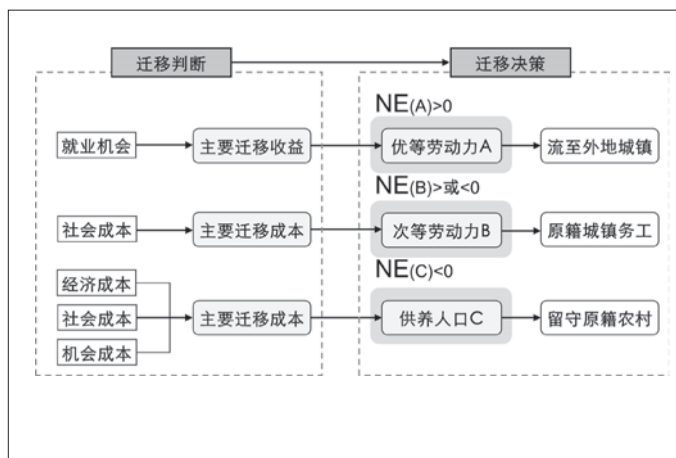


图12 外来农民工家庭的迁移判断决策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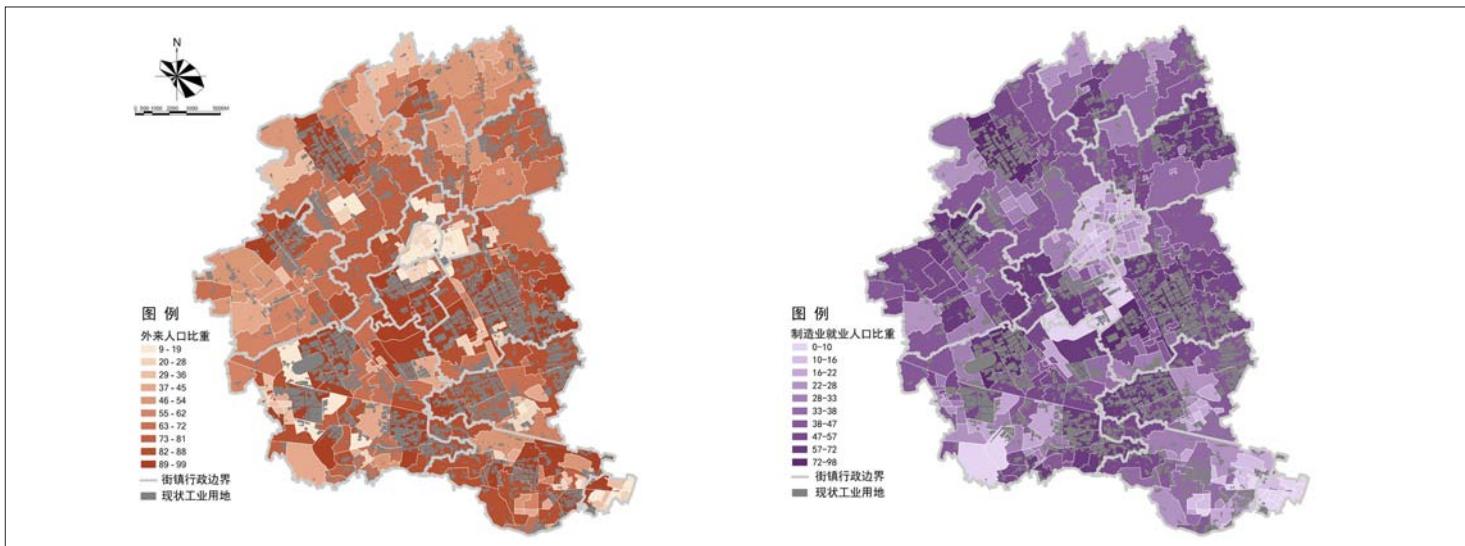


图13 嘉定区外来人口比重与工业用地关系及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与工业用地关系
资料来源:据六普和用地现状自绘。

注释 ②调研发现:在郊区城区租赁一套一室户的月租金为1 500—2 000元,在镇区的价格为1 000—1 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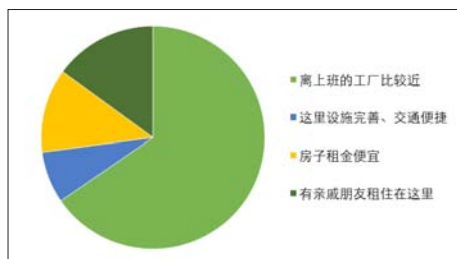


图14 外来农民工住在该村的主要原因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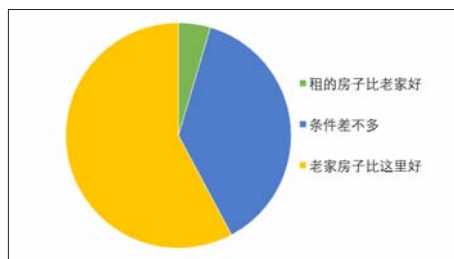


图15 租住房屋的设施条件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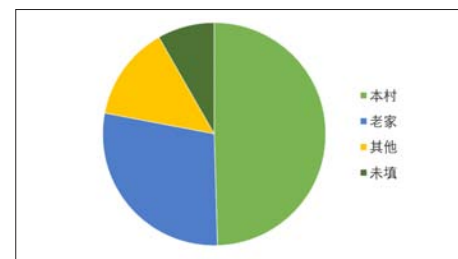


图16 小孩常年居住地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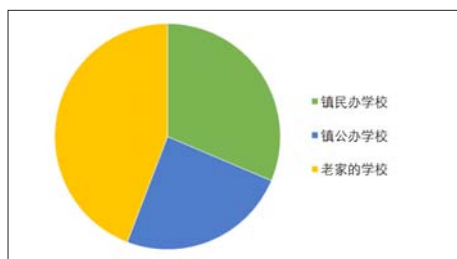


图17 小孩上学学校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及随迁子女学校的建立,使部分随迁子女能在本地公办及民办学校就读(图17)。家人团聚方式主要是每年春节,外出打工者回到原籍与家人团聚;而每年暑期,打工者也会接老家人女到郊区农村与父母一同度过。

尽管这样的劳动力配置是经济理性的,但实际付出了很大的家庭及社会代价。以家庭最优劳动力独自进城打工为主要模式的人口城乡流动,导致大量农村家庭成员的被迫“分居”生活,引发了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外出打工者无暇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女;而独自在外务工者,由于缺少家人陪伴及家庭生活和约束,行为失范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而本应由男性为主体完成的农业生产交给了留守妇女、老人甚至小孩,增加了其劳动强度等。而这种人口的区域性迁移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人口流动,在村庄拆迁或就业机会丧失时,外来农民工会向本镇其他村庄、附近其他乡镇的村庄或临沪地区转移(图18)。

2.2.2 对存量资产的配置

对外来农民工家庭而言,其以家庭为单元的劳动力配置权衡需纳入对存量资产的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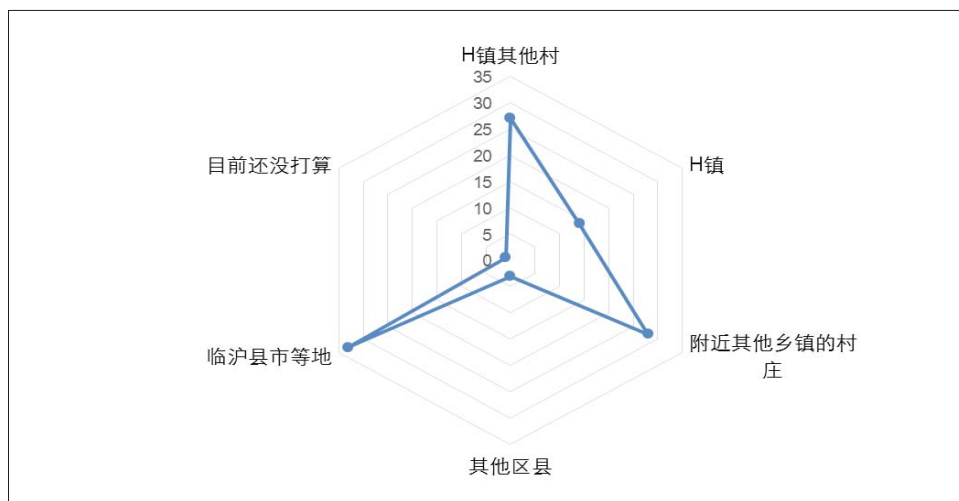


图18 外来农民工未来可能的流入地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益考量。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得益与承担保障和抵御风险功能使得农民难以完全脱离农村;由于举家迁移可能造成土地撂荒甚至被集体收回,因此家庭成员空间分离模式显然可降低农民工家庭的机会成本。留守原籍的其他家庭成员经营或配置承包地和宅基地、外出打工人群通过赚钱返乡建房的行为进一步维持农村家庭资产。调研显示,大部分农民工将其在原籍农村的承包地交由家人或亲戚,亦有少部分交由村里统一承包给他人或自行承包给他人种植,确保了存量资产的效用和收益(图19)。

与承包地的相对有效利用相比,外来农民工的住房存在明显空置,约1/3家庭的老家整套房屋常年空置(图20)。与空置状况并存的却是外出农民工的大量返乡建房行为。有研究显示,农民工收入的提高进一步促使了

其返乡建房的行为^[29-30]。整体而言,中国农民并没有因离家在外而减少对农村住房建设的投入。这看似非经济的资源配置实际暗含了多种动机或考量:一方面回乡建房包含着农民实际的居住需求,更为深层的原因还包括农民的炫耀性目的和对未来的预防性目的。

2.3 两类理性经济家庭的“互动”与“隔离”

2.3.1 空间生产:本地农民迁出与外来人口迁入的“互动”

若只考虑本地农民的流出、郊区城区和工业园区建设的推进,以及对农村空间的占用,农村人居空间理应逐步收缩、迁出群体转向彻底城镇化。然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承包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仅是用益物权,这种近似“共有”的性质决定了模糊的产权边界,集体成员的离去和加入都会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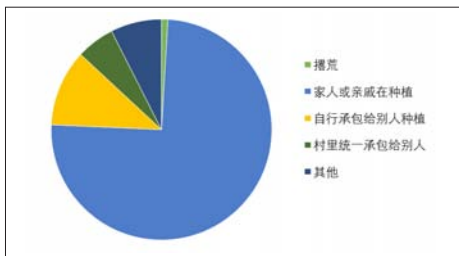


图19 调查外来农民工对老家承包地的配置模式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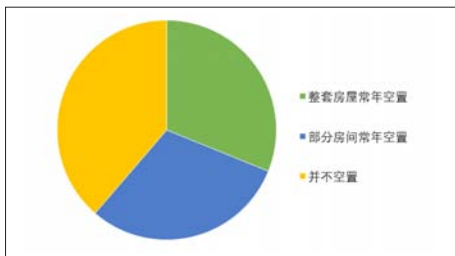


图20 调查外来农民工老家住房的空置状况
资料来源:对上海嘉定区北部某村庄的田野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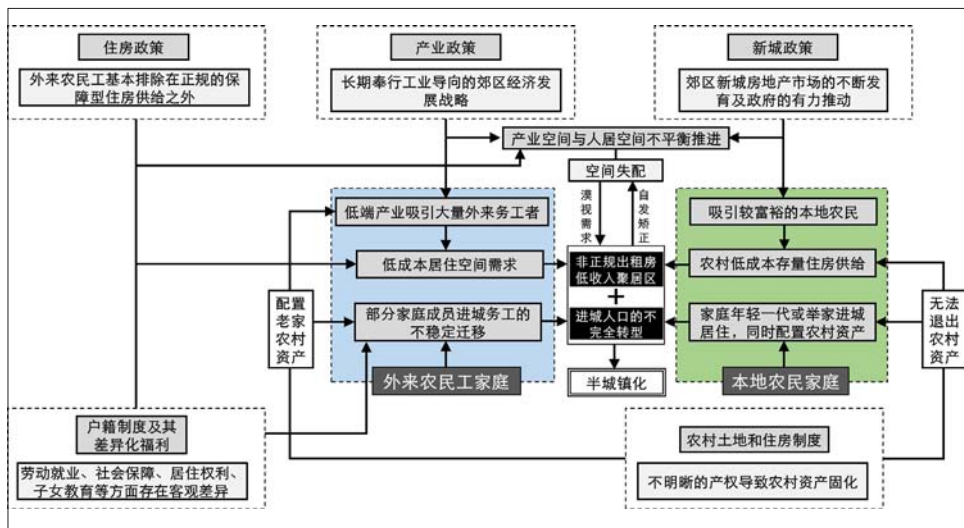


图21 半城镇化地域出现的机制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既有使用者的实际使用份额;而一旦选择退出集体,就可能失去分享“集体共有”财产的权利。尽管承包地流转已逐步推行,但承包地和宅基地及其附属住房的退出机制和经济补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外来打工者的涌入则成为郊区半城镇化地域出现的触媒。大量非正规出租房为特征的“半城镇化”空间地域正是两个理性经济家庭的互动结果。本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两个理性经济家庭均基于家庭效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理性应对既有的结构制约,这是半城镇化地域大量存在的成因机制。一方面,郊区的工业发展导向引致大量低成本劳动力需求,吸引大量外来人口;但由于政府对这类人群的低端住房供给缺位,引致了大量低成本居住需求。而郊区农民具有较强的城镇化意愿,新城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不断诱发本地农民的迁移行

为;家庭部分成员入住城镇住宅便腾出了村庄的存量住房,恰好契合了外来农民工对低成本住房的需求,实现了供需匹配。这种村庄非正规住房的出现也是对既有产业空间和人居空间失配的一种“自发矫正”。正是政府并未同步考虑产业空间所吸引的人群的居住需求,从而为周边的农村地区带来了“发展契机”(图21)。

2.3.2 社会分化:内外群体的分异与“隔离”

本地农民与外来人口这种“内外”群体的流动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市郊农村原先的熟人社会被打破,日益成为高度流动和异质性的空间地域。村庄内部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异与隔离现象。一方面,留守的村民主要为老人,与青壮年来外农民工在思想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由于地域差异在生活习惯上也难以相融,因此双方日常生活都尽量

不与对方产生交集,仅存在租赁关系;另一方面,大量人口涌入导致村庄整体空间品质与环境下降,外来农民工的素质受到本地群体诟病。而随迁子女近年来也逐渐“侵占”郊区乡镇学校,本地家长都不愿将子女送入这些都是“外地人”的学校^③就读,举全力在区内购房以改变学区使子女能在城区学校就读,这更加剧了阶层分异现象。此外,流动人口内部及与本地农民间矛盾频发、相关治安刑事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其中某些聚居点已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④。

3 结语

家庭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基本单元,理性经济家庭为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需要对内部劳动力资源进行统筹配置,而家庭内部的他性使家庭劳动力服从家庭决策从而实现跨区域流动,这是城镇化的微观动力所在。上海郊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地农民家庭和外来农民工家庭均可被看作为“理性经济家庭”,即使两个群体的自身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其家庭迁移决策及应对于现有制度约束的家庭存量资产配置模式的内在机理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这一认知有着深刻的政策意义。由于理性经济家庭的决策是置于现有的结构性因素之下的,未来需要在理解家庭决策内在动因的基础上,真正把握和呼应这两个城镇化主体的诉求,诸如现阶段本地群体对优质公共服务设施以及高品质人居空间的诉求、外来群体的稳定就业及子女基础教育和体面居住环境等诉求,通过体制、机制等的创新来改变过去那种看似低成本的城镇化模式和路径,从而真正增进各个群体的城镇化福利。[■]

(致谢:感谢导师同济大学赵民教授对本文研究和写作的悉心指导!)

注释 ^③如上海嘉定北部各镇的公立学校招收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比例均超过70%。

^④如上海市郊北部某镇就面临社会治安的难题,7万外来人口中,有犯罪前科的高危人群就达370余人,近年来该镇发案和110报警情况涉及外来人口的案件占九成以上(来源:《人口无序增长,徐行全面布控》, <http://www.jiading.gov.cn/Print.aspx?id=106869>)。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赵民,陈晨,郁海文.“人口流动”视角的城镇化及政策议题[J].城市规 划学刊, 2012 (2):1-9.
ZHAO Min, CHEN Chen, YU Haiwen. On urbanization driven by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2(2):1-9.
- [2] 朱金,赵民.从结构性失衡到均衡——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与未来趋势[J].上海城市规划, 2014 (1):47-55.
ZHU Jin, ZHAO Min. From structural imbalance to rebalanc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4(1): 47-55.
- [3] 朱金.特大城市郊区“半城镇化”的悖论解释及应对策略——对上海市郊的初步研究[J].城市规 划学刊, 2014 (6):13-21.
ZHU Jin.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eri-urbanization phenomena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the case study of Shanghai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4(6):13-21.
- [4]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6 (7):107-122.
WANG Chunguang. A study of floating rural people's 'semi-urbanization' [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6(7): 107-122.
- [5] 何为,黄贤金.半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类异化现象研究[J].城市规 划学刊, 2012 (2):24-32.
HE Wei, HUANG Xianjin. Incomplete urbanization: a research on China's urbanization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2(2):24-32.
- [6] 朱金.特大城市郊区的半城镇化困境、成因机制及对策探讨——对上海郊区的研究[D].上海:同 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ZHU Jin. Dilemma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emi-urbanization phenomena in metropolitan suburbs: case study of Shanghai [D]. Shanghai: The Dissertation for Master Degree of Tongji University, 2015.
- [7] Bowles S. Migration as investment: empirical tests of the human investment approach to geographical mobility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0, 52(4): 356-362.
- [8] 马颖,秦永.发展经济学视角中的家庭经济理论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 2008 (5):79-83.
MA Ying, QIN Yong. Research progress of family economic theory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perspective [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8(5): 79-83.
- [9] Bonney N, Love J. Gender and migration: geographical mobility and the wife's sacrifice [J]. Sociological Review, 1991, 39(2): 335-348.
- [10] Ortiz V. Migration and marriage among Puerto Rican wome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6, 30(2): 460-484.
- [11] Goldscheider C. Migr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analytic issues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developing nations[J]. Sociological Forum, 1987, 2(4):674-696.
- [12] Itzigsohn J. Migrant remittances, labor markets, and household strateg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ow-income household strategies in the Caribbean Basin [J]. Social Forces, 1995, 74(2):633-655.
- [13] Radcliffe S A. The role of gender in peasant migration: conceptual issues from the Peruvian Andes[J].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91, 23:129-147.
- [14] Clark W A V, Huang Y. Balancing move and work: women's labor market exits and entries after family migration [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06, 12(1):31-44.
- [15] Zhao Y.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9, 47(4):767-782.
- [16] Odland J, Ellis M. Household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regional variation of out-migration rates[J]. Demography, 1988, 25(4):567-579.
- [17] Zhu Y.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form[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7, 31(1):65-76.
- [18] 赵民,陈晨.我国城镇化的现实情景、理论诠释及政策思考[J].城市规 划, 2013 (12):9-21.
ZHAO Min, CHEN Chen. Current situation,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s on policy agenda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 (6): 9-21.
- [19] 赵民.关于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的若干见解,见《新 型城镇化座谈会发言摘要》[J].城市规 划学刊, 2014 (1):1-2.
ZHAO Min. 'Some viewpoints o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on 'point of views from symposium on new urbanization'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4(1):1-2.
- [20] Cerrutti M, Massey D S. On the auspices of female migration from Mexico to the United States[J]. Demography, 2001, 38(2):187-200.
- [21] 孟欣,林浩锋.家庭决策与短期决策——解读中 国农村劳动力的不稳定迁移[J].商业时 代, 2013 (36):18-20.
MENG Xin, LIN Haofeng. Household decision and short-run decision: interpreting unstable migra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s [J]. Commercial Times, 2013(36): 18-20.
- [22] Becker G S.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6): 1063-1093.
- [23] 檀学文.家庭迁移理论综述[J].中国劳动经济 学, 2010 (1):267-297.
TAN Xuewen. A review on theories of family migration [J]. China Labor Economics, 2010(1):267-297.
- [24] Davanzo J. A family choice model of U.S.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based on the human capital approach [M].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2.
- [25] 程琳.上海市郊区城镇快速发展进程中人口聚居 实态研究——以沪杭轴沿线四个城镇为例[D].上 海: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CHENG Lin. Survey and analysis on the population concentrating of the rapid developing suburb towns in Shanghai: case study on four towns along the Hu-hang Highway [D]. Shanghai: The Dissertation for Master Degree of Tongji University, 2006.
- [26] 付磊,唐子来.上海市外来人口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 特征与趋势[J].城市规 划学刊, 2008 (1):69-76.
FU Lei, TANG Zilai. The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hanghai and its evolu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8(1):69-76.
- [27] 刘丽娟.大城市郊区流动人口聚居问题研究[D].上 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LIU Lijuan. Study on the large floating population entering suburb area [D]. Shanghai: The Dissertation for Master Degree of Fudan University, 2006.
- [28] 陈依岚.大城市郊区流动人口聚集问题研究—— 以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为例[J].西北人 口, 2008 (3):23-26.
CHEN Yilan. Research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ettlement in suburb of big city: take Huaxin Town of Qingpu District for example [J].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008(3):23-26.
- [29] 胡建坤,田秀娟.农民工回乡建房行为研究[J].农 业经济问题, 2012 (12):53-60.
HU Jiankun, TIAN Xiujian. An empirical study on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going back to build farm houses in China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2(12): 53-60.
- [30] 王曼.北京农民工消费与储蓄选择——基于实证 基础上的理论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0 (6):76-80.
WANG Man. Choices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saving for migrant farmer workers in Beijing: atheoretical research based on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J]. Journal of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05, 20 (6): 76-80.